

從農夫到學者

沈宗瀚的故事

胡有瑞

三十多年前，蔣彥士常常這樣想：「將來，我們學問能有沈老師一半好就行了。」

對物理學家沈君山來說：「父親的學問好，道德高，是我終生效法的榜樣。」

八十二歲的沈宗瀚博士却說：「我是農家子弟，在困苦中求學，能有今天，我很滿足。」

訪問沈宗瀚博士，一直是我的意願之一。因為，說到中國的農業發展及農業研究，自然地就會聽到沈宗瀚博士的大名。

那天，我依約走入農復會顧問室，沈博士已經端坐着候客，而且，他已將自己這八十年來的經歷寫了個提要，從這種小地方，我就覺得他是個細心而體貼的人。

對他來說，這一生他都擁有一個好習慣——守時。

他一點也不顯老，算算，今年該是八十二歲了，灰褐色的西裝，暗紅色的領帶，看起來年輕而精神。難得



的是，慈祥的笑臉上，閃現着積極、沉穩而樂觀的神采。

說這一生，他首先這樣說：「從小，我的環境很苦，也可以說，我是在窮困中自我奮鬥地求學問。」

接着，他又給了我這樣一個概念：「我們那個時候，學農的很多，不過，我是唯一的農家子弟學農的。」看看面前這位愉悅、滿足的長者，再想想這些年來他與農復會的種種，我拿起了那本綠皮燙金題字的「沈宗瀚自述」，決定要好好地發掘這位農業專家勸學及成功的秘訣。

在自傳中，他這樣寫着：「余生長農村，自幼幫助家中農事，牧牛、車水、除草、施糞、收穫、晒穀、養蠶、養鷄等，頗為熟練，且深悉農民疾苦，遂毅然立志為大多數辛劬之農民服務。」

胡適博士在為這本自傳的前半部「克難苦學記」寫序時，對沈宗瀚的苦苦歷程，不僅讚佩，且極同情，他曾這樣寫着：「這一自傳是最有趣味、最能說老實話的，也是最可以鼓勵青年人立志向上的。」

胡適博士說，在「克難苦學記」中，下面這些記載讀來使人感動、佩服：

「沈先生十五歲考進餘姚縣第四門鎮私立誠意高等小學堂，因為家貧，取得寒額待遇，可免學宿膳費，在這學堂住了四年，民國元年冬季畢業。在這四年之中，他父親供給了他七十二元的學校費用（包括書籍雜費）。沈先生說：「此為吾父給余一生之全部求學費用也。」

「他十八歲才畢業高等小學，那時候，家中經濟狀況更困難了，他父親不但無力供給他升學，並且還逼迫他畢業後就去做小學教員，要他分擔養家的責任，這個繼續求學與就業養家

的衝突問題，是他青年時代的最大困難，也是他克難苦學記的中心問題。」

沈先生的父親對他說：「如吾有田，可賣田爲汝升學。如吾未負債足以自給，吾亦可借債送汝升學。乃今債務未了，利息加重，必須每年付清利息。如無汝之收入，吾明年利息亦不能支給，奈何？」

要養家，要升學，就在這種生活逼迫、精神威脅中，沈博士以毅力，以決心，依然能在萬難中完成農科學業，而且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。當然，這其間，他爲了求知所受到的金錢壓迫是極大的，他曾用計騙過父親，也曾問人借了皮袍到北方就讀，而爲了學費、生活費，以及負擔家中的債務，他不僅節衣縮食，而且每每東挪西補。

真是不容易，而今他成爲飽學的農業專家，想想那一段艱困的苦學歲月，他會怡然自得地說：「我很滿足，以我的環境能讀到博士學位。」

讀書與治學

「我喜歡讀書，可不喜歡背書。」

沈博士的文筆暢達，國學根基深厚，他說：「從小吃了不少背書的苦。」

他回憶自己，是七歲啓蒙，第一篇讀的是詩品，第一天讀頭二句：「大用外腓，真體內充。」一開始就是背，「我真害怕背書。」

書雖然不會背，他的文章可寫得好，而且文思流暢，引經據典，很得父親和老師的誇讚。他說：「我想我很有悟性，書雖然不會背，作文時要引證書文，我可是記得很清楚。」

在幼年，他先後讀了孝經、四書、左傳、詩經、古文觀止、東萊博議等書，這些都奠定了他國學的根基。當時，他除了讀書，每天還要下田工作，在田野間辛勤栽種時，他常想：「爲什麼有人種的田好，有的田

種不好，一定有原因。」

同時他也感到，農人太苦了，每天辛勤地做，收穫却極有限，遇到了病痛更是苦。「我的三哥就是得了寄生蟲病，那種苦楚真是使人受不了。」因此，他就想，農夫忙田事，除了辛勤還得再有方法才行。

日常進修中，他承認自己受王陽明、曾國藩、梁啟超三人的影響最大。「我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下過一番工夫；曾國藩的做人，尤其是他勤寫日記，使我也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，有時記思想、有時記日常瑣事。」而梁啟超所提倡的愛國民主思想，更震盪了他整個心靈。

「做一個有用的人。」這是他受到這三位學者的影響後，對自己所定下的原則。

他當時想：「中國最苦的為農民，而我最瞭解的就是農業，學農吧！」

那年他才十七歲，於是，這分意願就持續了大半輩子。他由寬橋甲種農校讀起，然後就讀北京農業專門學校。

「當年，去學農的並不是出身農家的子弟，大都是考不取別種學校退而學農的富家子弟。真正出身農家又學農的，我是第一個。」

在求學期間，他日以繼夜的讀書，他自己鼓勵自己：「余學不如人，若不迎頭趕上，則成不學無術之人，在社會為一寄生蟲，余生何為，倘勤學而死，尚可顯示余之努力，所謂鞠躬盡瘁是也，勤學而能自立立人，做一番轟轟烈烈之事業，則生而有趣矣。」

抱着「非讀書不行」的意念，從中學以迄留學，他不放棄每一個深造的機會，也不放鬆每一分鐘讀書的時刻，除了學校的課業，他更努力自我進修。

「讀書的方法很重要。」他說，自己看書之餘，遇到不懂的必定去「問」，而且看了書必須用「思想」，也就是用分析的法則尋求新知識。

他承認，「這一生的求知心極強。」時時感到「學問不足」，於是逼迫自己更用功的讀書。

「中學開始我們學過日文，當時是隨便學的，課外進修我全看日本書，以前的日文書比較容易看，其中有許多中國字，後來一想，日文書多半是翻譯自英文書籍，自己為什麼不學好英文呢！」

在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時，沈博士決定學好英文，說了就做。他規定自己每天必讀英文生字卡片十張，每天清晨就起來，在操場上一面散步一面背生字，而夜間就朗誦讀本，做文法練習、造短句。

他曾回憶那段苦讀英文的日子：「黎明即起，至操場朗誦並背誦生字四五十個，入晚再讀英文課本或作文，夜間常溫讀至一二點鐘或鷄鳴始睡，精力不繼，則於夜半食生雞蛋二枚，蛋冷凍使余清醒，並不致飢餓，自認乃省錢衛生之方法。有時倦不可支，則閉目凝神片刻後復讀。有時甚至以指甲切肉，或以握拳捶頭自醒。余不善記憶，以背誦生字為最苦。常自言木頭，何尚不刻入此字，故將手錄生字小冊藏於袋中，隨時隨地取出閱讀，人多見而笑之。余默嘆曰：世人何知余心苦，誤笑同為庸碌人。」

就這樣的苦讀，結果，他的英文說與寫都同樣流暢，也因此，考取了獎學金到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。

「不好高騖遠，不好出風頭。」這是他個性的寫照，讀書時如此，做學問亦然。

「農業是最講求實際的。」

問、想、辨別，這三樣，是沈博士治學的三大法寶。「不懂的就要問，要想，想通了還得與實際相連繫。」「我做過農夫，知道問的重要性，要知道農業處處是學問。」

每一個農夫，對耕種有過成功，也有過失敗，無論是成功或失敗，一次經歷就是一次心得。「我作過農夫，知道農人的困難，也了解他們可愛的地方，我更發現，天下最會想辦法的都是農人，他們要與大自然相搏鬥，也要與環境互相適應，遇到困難不想辦法怎行？」

「我常想，任何的工業，都是在一個房子中進行，而農業，生存與競爭的空間却是大自然。」

這五、六十年來，沈博士的治學空間，不僅僅限於書房，而是擴展到田野。「別人說，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，而學農的人却不行，必須要走到田間才行。」

遇到機會，他就到田間走走。「每次出去，必然會有『新得』，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，我一面看，一面學，更時時與農夫聊天，吸取他們的經驗。」

每走在田埂上，每獲得了心得，沈博士說：「那滋味真是樂趣無窮。」

「我常常對學生們說，學了農，不是研究幾十年就行，而是要研究一輩子。」

沈博士說，年輕時以及現在，他都喜歡聽演講，一生之中，他覺得最可珍惜，也是獲益最多的是在北平求學及教書時候。

「那時常聽名人演講，獲益良多，尤以杜威在教育部演講，胡適先生譯述，得益更多。」

對教育家杜威的科學哲學方法，研究事理，與處世爲人之道，從演講中他都深入的瞭解，他說：「修養更進一層矣。」

杜威的演講內容，沈博士深深記得，而且受益極多的有下列幾次：

民國八年十二月七日：杜威謂科學研究真理的方法，不外根據事實，以實驗求得真理。事前有一計劃，預防種種失敗，故遭遇失敗時毫不灰心。更以毅力詳推失敗之理由，俾得發明理由。

民國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：杜威謂教授科學，當由日常日用之物着手，年進一年，以成專門學者。最後之研究，亦宜以實用爲目的。

民國九年二月十五日：杜威講道德教育，教育當訓練人之謙虛，無成見，負責任，事前再三籌思，預知事之難處，決斷實行時，務宜堅持到底，百折不撓，成敗禍福一由自任。」

生平的樂事

子曰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一樂也。而沈博士也常說，他這一生最得意的事就是教書。

「我只教了十一年的書，但我的學生，個個比我好。」說話的時候，語音是高興中透着得意。而實際上，國內有數的幾位農業學家，全是他一手訓練的學生，而且，如師如兄的情誼，三、四十年來依然濃醇、依然芳馥。

展開教書的工作，是民國十五年的三月，他從康乃爾大學學成歸來以後。「我除了教書，並主持小麥、高粱、水稻等育種工作，直到廿六年，因抗日戰爭政府西遷，才辭了金陵大學，整整教了十一年。」

在金陵大學，他教遺傳學與作物育種學。那十一年裏，他的嚴，是有了名的，可是，學生們仍然願意上這門課，「因為可以學到很多。」

沈博士說，「我訓練學生，要他們：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。不知道絕不可停下來，一定要看參考書找出答案，書中如果沒有，就得做實驗去發掘。」

「學生們對我沒辦法，因為，我自己喜歡到田裏做實地研究，學生們也只有跟着去做。」

在他的記憶中，學生們最怕「插秧」了。可是不插不行，在「沈老師」的面前，不做就是不行，絕不通融，也絕不折扣。

「我常說，學生和教師必須同樣用功，教學才有進步。」

「上課前一天，我自己必定作充分的準備。一上課，先對前堂課教的作五分鐘的口試，或者是筆試。而且，上課必定點名，絕不准請假及遲到。」

在當年的金陵大學，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：

已故的農林廳長金陽鎬，當年是金大足球隊的中鋒大將，有個星期六的下午，沈教授要補授遺傳學實驗，剛巧那天是金大與聖約翰大學的足球賽，於是體育老師特別爲金陽鎬向沈教授請假。到了星期一上課時，金陽鎬的口試得了零分，學期平均分數也只得了丙。從此，金陽鎬就退出足球隊，絕不敢再請假。

這個故事，沈教授也常常愛向後輩提起，而且他一再說明，金陽鎬平時就是他最喜歡的學生，就由於愛護

他的才，更不放鬆教誨了。

現任教育部長蔣彥士也是沈教授的得意門生，在跟隨他受教和工作中，沈教授說：「我的嚴，讓他吃足了苦頭。」記得，蔣彥士任助教的時候，每天的工作更重、更苦，因為，沈教授全副心力都放在教書和研究上，每天來得早走得晚不說，每到週六和週日，他更是全天候下田作實驗，擔任助教的蔣彥士也只有陪同工作。「後來，蔣太太曾經向我訴苦，當年他們交朋友時，蔣彥士約了她看電影，一聽老師週日下田，也就只得取消約會了。」

一說起這些往事，一說起這些學生，沈博士的神情就份外的愉悅，也格外的精神。

「對待學生，我全用誠和苦心，要知道，所教的學生一定要比自己好，這樣國家才有希望。」書生報國的心懷，就這樣淡淡地流露了出來。

在教學中，沈教授也常常發掘自己的不足而求取更進一步的知識。

當年，兩位由化學系轉到農學院的學生章錫昌和蔣彥士，沈教授發現他們兩人，在補讀農學院功課時，理解力強，成績極佳。「我因此發現而且相信，學農的學生應該多讀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的功課，科學基礎立穩，可以訓練理解力。」

這時，他也發現自己在數理方面也應加強，於是：「我立即到數學班旁聽大代數和微積分。那時，教授旁聽，在學校是件稀奇事。」

沈宗瀚與蔣彥士

每天，我都要到教育部採訪。

那天，就在走廊上遇到了教育部長蔣彥士。我想，他是沈博士的得意門生，何不聽聽他心目中的「嚴師」

的形相。

「你要我談談沈先生，好，真好，我想，我是最瞭解他的學生了。」蔣部長笑咪咪地一口就答應了。

看看日程表，部長的會似乎排得滿滿的。他側着頭想了想：「要談，要仔仔細細好好地談，三言兩語是說不完的，我要找一個長點的時間。」

短短的幾句話，就可以聽出，沈博士在這位「部長學生」的心目中，那分量是有多重，這情感又有多濃。

「沈先生的學問真是好得透頂。」蔣彥士心悅誠服地形容他的老師。

在金大農學院，教遺傳學和育種學的沈教授，是學生敬長的偶像。「他騎着一輛腳踏車，穿校在田間，每看到他，同學們就想，『有一天，我們的學問有他一半就好了。』」

「他教課真嚴，誰缺課，他必定責備，而且他很守時，絕不浪費一分鐘，當時他是全校一流的教授，我們都以他做為模範。」

沈教授除了教課外，也任中央農業試驗所總技師，負責全國性小麥改良工作。「他所負責的金大2305小麥育種，曾是長江流域最好的品種。」接着，政府成立全國稻米改進所，也是由沈博士負責。

「我畢業後，沈先生介紹我到這兩個所工作，擔任他的助理，我們經常要在田中工作，看小麥的品種、試驗，他觀察極敏銳，極認真。」

最令蔣彥士佩服和難忘的是：「沈先生在田間看小麥雜交的後代，簡直就像看相一樣，準確無比。」

在那段日子中，生活是够苦的。「我不是農家子弟，以前根本沒有下過田，跟隨沈先生工作後，那工作和情景，簡直讓我成爲了一個小農夫。」

除了工作時，沈先生釘牢蔣彥士外，到了晚間，還逼着他讀書。「他要求我們嚴，每本有關的書都要我們讀，逼着大家不斷地進修。」

學問之外，蔣彥士更佩服老師的爲人和修養。「他是經師，也是人師。」

「他是位重感情，具有犧牲、服務精神的人。」蔣彥士回味着過往，他懇切地述說着。

「民國廿六年，政府遷到大西南，我們也跟着疏散，當時規定每個人只准帶一個鋪蓋、一個箱子。我一看，沈先生帶了一箱的舊衣服，當時我就請他換幾件好點的衣衫，沒想到，他立即正色對我說：「逃難，怎可穿新衣服。」」

在蔣彥士與沈博士相處的年歲中，他深切體認到沈博士「念舊」情感的深濃。「他是一位有充沛情感的人，不僅是對人，對物也有着極深的念舊心。」

「沈先生在長沙時，曾完成了克難苦學記的手稿，由我代他抄寫，抄完全書，我更欽佩他是位性情中人，譬如，他出國留學時，需要添製衣裝，他全買舊大衣、舊皮鞋，處處表現他克勤克儉，不慕虛榮的心性，而書中字裏行間所流露出的，就全是一片濃重的感情。」

「逃難，誰不想爭先恐後！可是，沈博士交代學生們「絕不可爭，一定要讓。」他又告訴大家：「愈是困難時，愈要讓人。」

在一股勁地讓之下，蔣彥士說：「結果，我們上了船後，沒有床位，只有不睡覺站到了漢口。」那滋味是够苦的。「我們在沈先生精神的感召下，只有咬緊牙關地撐下去，犧牲、服務，一直是他做人的原則。」

「他做事有毅力、有耐力。」蔣彥士說，抗戰勝利復員回到江南，沈博士負責中央農業試驗所的工作。「那日子真苦，大家住在鄉下，環境很差，像我，一家三口只有一小間房，大家賺的錢只够溫飽而已，而沈先生與我們同住，同樣的吃苦，在他的帶領下，苦雖然是苦，但精神上大家非常開心。總認為我們是在大自然環境中在為中國的未來而努力。」

沈先生常常說：「中國人口中，百分之八十為農民，地大物博，農業復興可以增產報國。」抱着這一目的，一羣學生就緊緊地跟隨着他的左右。「我們是志同道合，像金陽鎬、馬葆之，我們一直跟着他。」這一羣，就陶醉在自己的理想中，絲毫不受物質的引誘。

蔣彥士常說：「沈先生不僅是農業專家，也是政府農業政策的重要諮詢人。」對國家農業政策的改進，以及中國農村復興工作會的成立，全是沈博士的構想。「大陸淪陷之前，農業高級技術人員能來到臺灣，也是沈先生的功勞。」

「沈先生極爲欣賞和培植年輕人。」對學生他是苦心地栽培，遇到有才華、有潛力的年輕人，他一樣地提拔。「他是位沒有派系觀念的人。」

「在他的周圍，他隨時發現和提拔人，不問學校，不管來歷，只要有學問、有見解、肯努力的，一律培植。」

最使蔣彥士這一生都念念不忘的，是沈先生肯爲學生的未來作最好的考慮，而且極具苦心地引導。

「去美國以前，我曾問沈先生應該選那所學校。當時學農的都是進美國康乃爾大學，沈先生却要我選明尼蘇達州立大學，他的理由是：已經有許多人進入康乃爾大學，應該有人進入其他的學校，吸取各大學的長處，爲了國家的需要，應該有多方面的知識，更多的科學技能，來教導學生，培植更多的農業人才。」

「快學成了，國內很多大學都約我回去任教，就在這時候，沈先生到大西洋城出席世界糧農組織會議，會後，他就趕到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小鎮來看我，那時我正在那裏，負責玉米、牧草的改進試驗工作。」在異國的小鎮，師生重逢，那情景，那感覺，一直到現在，蔣彥士依然歷歷在目。「沈先生當時對我說，『我想，這一生我都不會再有機會到這個小地方了。』」

沈先生越過千山萬水去看蔣彥士，目的是告訴他，回國後應該回到中央農業試驗所工作。蔣彥士在感動之餘，只有滿口答應。

「他做事就是這樣，要做，一定徹底地去做。」

在蔣彥士的生命中，對沈博士有着特殊的情感及特別的感激，他鄭重而具感情的說：「這一生，我都感激他，而且也以他爲模範。」

嚴父與才子

素有「才子」之稱的物理學家沈君山，就是沈博士的公子。

沈君山除了在科學上的造詣外，從學生時代一直到現在，他都是具有多方面才藝的一位，文章寫得好外，他是橋牌國手，也是圍棋高手。沈博士一提到這位愛子，臉上的笑意一定是更濃、更深。而才華橫溢的沈君山，對父親，他是敬畏又推崇：「爸爸真了不起」。

從小，沈博士對沈君山的管教是極嚴的。「我是以身教為主，我喜歡讀書，也希望他們多讀書。」

沈君山在臺大唸書時，非常活躍，尤其喜歡橋牌和圍棋。有時深夜回家，絕不敢叫門，都是爬牆而入。有次，就被警察看見，還誤以為是小偷。

沈君山很喜歡說這樣的一個故事：

「民國四十四年全省橋牌比賽，我得了冠軍，當我與沖沖地將銀盾獻給父親時，他將我的銀盾放在廁所中。後來我妹妹在衛理女中得了英語比賽的冠軍時，父親就高高興興地將銀盾放在客廳，我說父親偏心，他的理由是，唸書時應專心求學，不應有太多活動。」

在唸中學時，沈君山極為好動和調皮，嚴厲的父親，想想決定用古人「易子而教」的方法，他將沈君山交給好友錢天鶴管教，也是飽學之士的錢先生，也就毫不客氣地代友人管教起沈君山來。

對沈君山來說，如今的學問與成就，都應歸功於父親的薰陶和教誨，也因此，他對父親的感情更為依戀和敬仰。

退休後的生活

沈博士是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從學生時代受洗起，此後的六十年間，他必定天天祈禱及看聖經。

「我做人，是本着宗教的精神和孔夫子的道理。」

對學生、對同事，即使是對朋友，沈博士的做人都是很成功的，因此，學生慕敬他，同事服從他，朋友喜愛他，問起他做人的密訣，他說：「實實在在的做人做事就行了。」

在他的生活中，他時時記得：視別人如視自己，就抱着這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信念，使得他處處都留下了友誼，也時時會收到回報。

「對任何事必定盡心盡力，成敗絕不放在心上。」

「我是經歷過困窮的，因此我喜歡幫助有困難的人。」

在教學生和待同事時，他總是「他們的長處不忘誇讚，有了缺失私下規勸，我們應鼓勵大家用自己的長處，以改進自我的短處。」

因此他勸導人時，必定是先稱讚再批評；一方面勉勵，一方面勸導。「我總以善意對人，不批評人，也不苛責人。」而他也時時記得「要寬以待人，嚴以責己。」

毅力和耐心，該是他成功的鑰匙。

「我每天必打太極拳，從二十歲到現在，六十年來我必定天天打，那怕是在飛機上，我也會比劃幾招。」

「以前我是抽煙的，大概是十五年前，讀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說，抽煙可以幫助思想，但抽煙也可以使思想突然地中斷。想想這句話很有道理，從那天起我就下定決心戒煙，一戒就成功了。」

我問他喝不喝酒，沈博士笑了。

「紹興是出酒的地方，從小我就能喝酒。」不過他很有節制，只好酒而不酗酒。「我的量，最好的紹興酒可以喝三、四斤。」

日常生活中，除了看書、寫作外，他還雅好平劇，每有好的平劇，他必定是忠實的觀眾。「我不跳舞，也

「不打牌。」

不過，十三年前，他的「肯肯舞」技還拿過冠軍。問起這檔雅事，沈博士哈哈大笑。

「一九六四年我到日內瓦出席聯合國會議，會後到巴黎遊覽，應大使的邀請去觀賞夜總會的表演，突然宣布要場內觀眾舉行肯肯舞比賽，我與兩位美國人，一位法國人被選，大家穿起了裙子，比賽時我想這簡單，打幾手太極拳就好了，沒想到還得到冠軍，一時連報上都登了照片，也出了陣小鋒頭。」

如今他已經退休了，不過，他可是閒不住的人，因此，農復會的顧問室就成為他每天必到的工作室，「我在這裏會客，也寫寫文章。」

顧問室中的書架上，排列着不少的中英文的書籍，以及一夾夾的參考資料。「在這裏寫文章方便，資料全有。」

他的著作真是不少。「我的著作是由思想、研究、環境需要而成。常先思想一個題目，經數年研究試驗調查得到結果或結論寫成短文。短文累積，再彙編成書。」

算算自己的成績，從民國九年至六十三年，共有中英文著作二百九十五篇，中文的農書三本、英文農書三本，以及那本「沈宗瀚自述」。

「退休後我的研究興趣依然不斷。」因此，在他的手上仍在忙着兩篇研究。一是「臺灣家庭農場的改進」，一是有關大陸農業的專書。

「人的年紀可以老，研究興趣可不能斷。」除了在書房寫作外，他也時時到鄉野參觀。「上星期三我就到屏東參觀養魚、養蝦的研究。」

苦幹實幹，一份永不衰竭的熱誠，使得這位有着中國綠色革命之父的學者，永遠生活在浩瀚而豐足的學問之海中。

註：胡有瑞女士一系列為本刊撰寫之學人事訪，已定名為「現代學人散記」，將於近期內由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